

## 新华社记者调查“iPad一代”现状——

## 谁在制造孤僻的“电子娃娃”？

“六一”儿童节前夕,关于“孩子最想要什么礼物”的网络探讨中,iPad、iPhone等苹果旗下的智能科技产品“名列前茅”。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将销售渠道扩展至早教市场,“iPad一代”悄然成型。“电子保姆”的诞生对传统教育理念形成冲击,面对“中国正在制造孤僻‘电子娃娃’”的质疑,家长们怎能“袖手旁观”？

□新华社记者 俞菀 黄安琪 罗争光

## 1问

## “电子保姆”为什么能占领早教市场？

“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来到上海徐家汇商业区的苹果销售店,看到许多孩子拉着父母在iPad样品前“软磨硬泡”。客服人员仲小姐介绍,从二代电脑开始,苹果就依靠大量教育软件提高市场占有率。在“APP Store”(苹果商店)的搜索菜单里,针对低龄儿童的应用软件不下百种。

记者调查发现,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走俏的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不少家长认为,该类产品及其应用软件具有开发智力、开阔视野的教育功能,孩子们更乐于接受。

“很多资源都浓缩在一个

电子产品里,教育孩子比较便捷。”学生家长杨庆孟告诉记者,比如家里没有钢琴,可以用iPad弹虚拟钢琴。

第二,很多孩子表示,拥有iPad才能拥有“话语权”。目前,中国许多城市的课堂教育正在引入“电子书包”,其操作原理与“iPad”可谓大同小异。有“经验”的孩子很快就能上手,而没有接触过这类产品的孩子则容易被“边缘化”。

第三,iPad等智能电子产品似乎具有一种“魔力”,能够让孩子瞬间被吸引并安静下来。家长们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觉得有这样的“电子保姆”未尝不是件好事。

## 2问

## “iPad一代”会成为孤僻的“电子娃娃”？

随着孩子们对高科技新“玩具”上瘾,质疑也越来越多。以“00后”为主体的城市青少年被很多网民称为“iPad一代”,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智能科技产品的兴趣和依赖度远远超过以往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用电子产品进行“拇指交流”大行其道,人际交往的时间和技巧反而弱化。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青少年工作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iPad一代”的产生,一方面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家庭氛围密不可分。这些新一代独生子女,注定游走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他们的父母主要是“75后”,文化程度较高,思想开放,生活条件优越,陪伴孩子成长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不多,孩子在智能电子产品与虚拟世界的“包围”中成长,容易自我封闭。

另一方面,当代城市生活中,提供给这一代孩子的社交空间与娱乐场所非常有限,孩子缺乏参与公共活动的兴趣,只好依靠智能电子产品排解寂寞。上海中远实验学校8岁的蒋雨婷说,没有

iPad,她的生活会变得非常无聊。

专家们强调,虽然iPad的软件确实具有互动性和教学性,但它们无法替代传统的早教模式与人际交流方式。上海市心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坦言,大多数iPad游戏要求的是被动注意,低龄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思考能力、探索真实世界的好奇心和热情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与世隔绝的“iPad一代”思维逻辑会越来越像软件程序,无法承受社会复杂多元的挑战,甚至被打上孤僻“电子娃娃”的标签。“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不看对方眼睛,这和他们长期低头玩手机或iPad的习惯有很大关系。我甚至接触过说话时不用后脑勺对着我的孩子,感觉非常奇怪!”陈默说。

电子产品也可能成为“健康杀手”。记者走访了沪上几家医院,许多门诊医生都感到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对学生视力的影响逐渐增大:4岁宝宝近视200度,小朋友视力从1.0降到0.5,眼科诊室外孩子排排坐。

## 视点

## “iPad一代”需“手脑兼修”

然而,正如网民“冰块”所说:“iPad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本身并无利害之分,关键在于家长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合理使用。”

“iPad一代”在某些人类机能方面,肯定会比前人突出。黄洪基说:“手指的灵活对大脑开发有很大好处。我们不能因为老一代的观念而阻碍孩子们对新生事物的追求。”关键是家长要具有“适度”理性,预料到过度依赖智能电子产品的潜在危害。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说,其实iPad等电子产品的研发者,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过早接触该类产品,而是鼓励他们走进大自然,创造一些游戏。手脑并用的传统学习方式,才是开发心智的关键。

同时,学校和社会要为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提供保障。此外,“别让计算机文化泯灭了孩子对传统游戏的兴趣。”网民“iNina控”说:“很多传统的智力玩具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烙印,那些经久不衰的玩具,如‘九连环’、‘毽子’等,也应该给孩子了解和接触的机会。”

## 今日视点

## 培养孩子自救能力,六一最好的礼物

5月28日10时22分唐山发生4.8级地震,唐山英才学校2300多名中小学生和310名教职工仅用6分钟全部安全撤离到操场,学校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这段视频上传互联网后好评如潮。

(5月31日《中国青年报》)

这不是演习、不是训练,而是地震突然降临后的紧急逃生。观看视频及相关报道,英才学校的教师、学生非常从容,镇定自如——大地震时学生护着头蹲在课桌旁,老师迅速打开教室大门,组织学生有序撤离,一男生背着同班一名左脚骨折尚未痊愈的同学一同逃生,危难时刻休戚与共,真情护佑让人感动。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该校

学生如此镇定令人惊叹。这种镇定和逃生技能,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据了解,学校每两周组织一次逃生演练,孩子入校的第一堂课是防灾避险教育,应急逃生疏散路线被制成示意图张贴,学生人人熟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因为平时逃生训练不是演戏,“战时”才能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笔者以为,唐山英才学校的这段撤离视频十分珍贵、有价值,是真实的实战避险逃生教材,值得在所有中小学播放。儿童节到了,培养孩子面对灾难的逃生与自救互救能力,无疑是最好的六一礼物。

我们通常所说的灾难包括两类,一是自然灾害,如地震、洪

灾、海啸等;另一类则是人为因素或故意伤害造成的灾难,如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等。心理学家经过测试证明,一个没有经过专门抗灾训练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灾难必然产生恐惧、惊慌,很难逃过一劫。有调查显示,中国公民应对突发灾害的危机意识普遍较差,在灾难中自救或互救的逃生能力更差。中小学生在最容易受到灾害袭击的弱势群体,这主要源于他们年龄尚小,防灾知识和经验欠缺,应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十分脆弱。

汶川大地震后,中小学普遍加强了安全防灾与紧急避险教育,但许多地方尚未形成长效机制,因此对中小学生学习安全防灾教

育需要进一步强化与细化,譬如应将各种灾害分门别类编写成教材,内容包括灾害特点、逃生要领、急救常识等,列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课,编入教学大纲,与文化课“并驾齐驱”,同考试、同计成绩,真正做到灾难教育常态化。

当然,灾难教育既要学更要练,否则的话,孩子们的自救能力仍然无法实实在在地提高。“纸上谈兵”只是教会学生一些逃生常识,而灾难发生时能否正确逃生?主要取决于心理因素及经验,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通常心理素质很差,即使逃生知识背得滚瓜烂熟,大难临头时也会因慌乱而不知所措。(尹卫国)

## 热点纵论

## 副厅长请农民工吃饭,这个可以有

30日凌晨,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在其个人实名认证的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表示“希望大家多支持监督”。5月25日,陈里曾发微博称“想请几名农民工兄弟吃饭”。27日晚,陈里和8名农民工一起吃了羊肉泡馍。其间,有赴约的农民工将当晚吃饭的情况发上微博。

(5月31日《新京报》)

不得不说,现在有些网友患上了“作秀敏感症”,一旦有人做出一点出格、另类、不寻常的事情,马上就会被打上“作秀”的标签,加以质疑和非议。动动嘴巴,敲敲键盘确实容易,但这种质疑和非议,在无形之中却给当事人带来或大或小的压力,给他们的

生活和工作带来冲击。

就像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一样,不过是请几位农民工兄弟吃了一顿普普通通的羊肉泡馍,结果不出所料地被一些网友指为“作秀”和“炒作”。即使这真的只是一场“秀”,那么这样的“秀”也是可以作的,而且是越多越好。如果能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大大方方地请各行各业的底层劳动者吃饭、聊天、侃大山,则不但有助于加强官员对社会的了解,让官员更接地气,更恤民情,同时对于改善“官民关系”,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样大有裨益。

比如这次陈里副厅长通过请这几名农民工吃饭、聊天,就在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当中,充

分感受到了农民工的本分、善良、通情达理以及心态的阳光。虽然这8名农民工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农民工群体,但从他们身上获得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信息,显然要比道听途说的信息更真实、更可靠、更“原生态”。

陈里除了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身份之外,同时还是管理学博士、教授,长期关注“三农问题”,他坦言请农民工吃饭的,不是作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的陈里,而是作为“三农问题学者”的陈里,那么他请农民工吃饭、聊天,借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现状,无疑也是一个了解信息,搜集材料,进行研究的过

程,如果身为“三农问题”的学

者,却从不和农民以及农民工接触,才是不正常的。

其实,除了各级官员可以通过请农民工吃饭、喝茶来了解民情,体察民意之外,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市民、白领,也同样可以请农民工吃饭、聊天。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和各种各样的农民工产生交集,比如聘请保姆、装修房子、送水送报等等,但这样的交集,往往只是一种工作关系,双方很难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而在吃饭、喝茶、聊天的过程中,却可以更大限度地袒露心扉,了解彼此,这对于消除误解,增进了解、促进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苑广阔)

## 公民发言

## “禁止民工用餐”源于大学功利性

有位自称是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爆料称,自己在去学校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看见门口贴出一告示,上面写着:“禁止民工在此用餐,谢谢合作!”该学生顿时感觉一阵心酸,在就餐牌的时候问了一下缘由,对方解释称民工在食堂用餐影响卫生。(5月30日江西新闻网)

爆料的同学心生酸楚,其实,在大学食堂蹭饭确实越来越困难。被大学食堂拒之门外的,不仅是民工,还有白领,早从2007年开始,伴随着物价上涨下的日常生活成本攀升,就有不少高校附近白领都到大学食堂蹭吃“物美价廉”的饭菜,但最终多被管理者采用种种手段终结之。

这里需要讨论的,其实还是高校的开放度问题。公立大学事实上也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它需要向社会开放,当然,这应该以不影响大学基本的教学、科研与生活秩序为前提。为大学建造教学楼的民工多半不会影响食堂的秩序,所以,食堂谢绝农民工,完全站不住脚。

这真是一个怪异的现象。一方面,有些大学极力排斥诸如“蹭饭者”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它又对有钱有势者惟恐开放不够。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无非就是功利主义的影响,让一些大学越来越像个经济人。在经济人思维成为左右大学管理行为的最大力量,它总是会趋向于产出最大化的原则,如此之下,开放与否也成为某种利益算计下的选择。读懂了这一点,或许就读懂了民工与大学食堂的咫尺天涯:较之大学,他们并无任何向度上的“开放价值”。

由此说来,当作为大学建设者的民工也被拒绝于大学食堂门外,它孤立的远非民工而是大学本身。它让人不仅看到城堡化的大学,更看到功利化的大学。关于大学的开放性,有一句公众耳熟能详:大学应该无围墙,它的另一种现实表述不妨是,大学眼中应该无民工。(王聘)